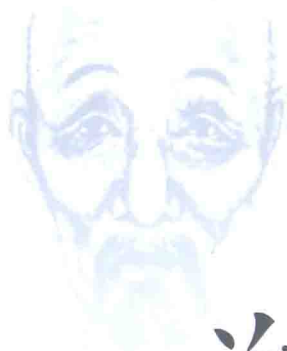


江苏
历代
名人
传记
丛书

总编

宋林飞

王庆五



郑板桥

王同书 著

他从小发愤自雄，
立志苦学惊人艺，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是他处世之道。
他写出“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官之心永流芳。
他罢官之后回扬州，
自树其帜，
咬定青山不放松，
最终铸就书坛奇峰。



江苏
历代名人
传记丛书

总编 宋林飞 王庆五

郑板桥

王同书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板桥/王同书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9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214-13991-7

I. ①郑… II. ①王… III. ①郑板桥(1693—1766)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4690 号

书 名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郑板桥

著 者	王同书
出版 统 筹	韩 鑫
责 任 编 辑	韩 鑫 石 路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 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3991-7
定 价	2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 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 37.5%,如清代文学家 1741 人中有 599 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

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

《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

宋林飞

2013年5月

序

3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成长的环境	(1)
一、清初政治、经济新局面	(1)
二、清初思想、文化新景观	(4)
三、繁华的扬州和水乡“桃源”兴化	(11)
第二章 游学与教书	(16)
一、清贫家世,凄苦童年	(16)
二、读书真州,画艺有新境	(23)
三、师从陆震,诗词打基础	(24)
四、书画脱颖,渐为人知	(25)
五、婚恋和“无一营”的生计	(27)
六、几番教馆,饱经冷暖	(28)
七、重天命,更重人事	(33)
第三章 待官研艺在扬州	(39)
一、穷秀才逃债流寓	(39)
二、中举丧亲,悲喜交集	(47)
三、新进士扬州卖画	(55)
第四章 为官政绩	(61)
一、“三县”的能员廉吏	(61)
二、重农爱民	(67)
三、同情保护人民	(70)
四、深沉激动的爱农诗	(74)
五、文昌县令	(81)

六、县令任外的得失	(89)
七、看清现实,自强不息	(94)
第五章 罢官后的胸怀	(101)
一、寻“君平”解积愤	(101)
二、漫游以消忧	(106)
三、文星会聚,“三绝”精进	(109)
第六章 郑板桥书画艺术的价值	(117)
一、艺术创作——“慰天下之劳人”	(119)
二、“三绝”以外的“绝”	(134)
三、书坛奇峰——板桥体	(148)
四、开拓文人书画新天地	(155)
五、艺商联姻的萌芽与启示	(168)
六、发现、总结艺术创作规律	(181)
七、艺术创作的效应和影响	(193)
第七章 “自出眼孔”的历史观	(208)
一、知古鉴今、无古无今的新史论	(208)
二、对历史辩证变化的认识	(217)
三、严纪明法谈吏治	(222)
四、扬清激浊说妇女	(230)
五、明理范世论教育	(242)
郑板桥年谱	(257)

第一章 生活成长的环境

“时势造英雄”，是说英雄豪杰是时代、形势造就的。其实不仅是英雄，任何一个天才，都可以说是时势造就的。因而要理解天才、研究天才，就必须首先理解产生与造就天才的“土壤”。郑燮（板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正是清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新局面、新景观，以及扬州、兴化肥沃的“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学艺术大家。

一、清初政治、经济新局面

郑燮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十月（1693年11月），去世于乾隆三十年十二月（1766年1月）。他的“功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康、雍、乾正是清朝最兴旺的时期。

“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郑燮：《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诗），郑板桥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比做周朝开国的四位贤君“文武成康”。清初四帝四朝在文治武烈方面也确是卓有建树。

明朝后期，君暗臣昏，社会风气淫靡奢逸，从皇帝、大臣到普通缙绅都以淫乐、长生为生活目的。对老百姓，特别是对农民严酷剥削，供自己“征歌选色”（郑词《念奴娇·弘光》），可以说整个统治阶层都腐烂了。人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官逼民反，盗贼蜂起。到崇祯时，李自成、张献忠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再加上邻邦清军，虎视眈眈，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虽不似昏朽，想振作有为，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闯”字大旗一经指向京师，朱明王朝就雪

崩般倒塌了。崇祯在煤山以一条绳索结束了一个朝代。清军趁乱而入,在吴三桂等汉奸帮助下,迅速打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取朱明而代之,开始了清朝对中国几百年的统治。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定北京为清朝首都,强化他的文治武烈,统一全国并巩固统治。从这时到雍正、乾隆,采取了多项政策、举措,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重大的有:

收买人心。清统治者知道明朝上层人士(包括军政大臣、各级地方官吏)是可以收买的,这些人害怕的不是清军,而是农民军(李张军队),于是清统治者就扮演起明朝统治者的卫道士的角色。为崇祯帝发丧,并宣布替忠于明朝的臣民“报君父之仇”,追剿逼死崇祯的“流寇”。在追击农民军的同时又优抚明朝降臣、降将,重用他们,让他们担任各种军政要职。并号召“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显爵,保证他们现有的身家性命和今后的荣华富贵。战争中俘获的明朝大员,都千方百计使之投降。一进北京站住脚跟,就宣布废除明朝的苛政,“三饷”加派一律取消。这样亡明的官僚以及在野的中小地主都有实惠可得,于是纷纷迎降清军。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同时,清朝统治者也要让明朝官民知道毕竟是“新主”来了,要按照“新主”的模式生活,必须要带上“新主”的“牌号”,于是就下了雉发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普天之下,男子都要“雉发”,将明朝男子满头长发剃去部分,留下的编个辮子垂在脑后,这是满族男子发型)。雉发,实际上是摧残汉族人民民族自尊心的举措,自然激起汉族人民极大反感,不少地方奋起反抗。有的降而复叛,遭到清军残酷镇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全国震骇。江阴以阎应元为首的“头可断,发不可雉”的誓言更为壮烈,在二十四万大军压城下,苦战八十一天,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反抗虽都被镇压下去,但都是压服而不是心服。(太平天国、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正是以“反辮子”作为反清的一个重要标志。)

况且清廷为了犒赏将士,刺激战斗力,下令“圈地”,强将大量民田(包括中小地主的)分给有功将士和八旗头面人物,前后共占耕地达十六万七百九十四顷,未逃走的农民沦为圈者的“庄客”,备

受欺凌、奴役、剥削，这也是激起人民奋起反抗的原因之一。

招抚明朝旧臣也好，优待将士也好，都是为了组成强大的统治集团，“以马上得天下”！正由于清朝统治者得力的举措，清廷有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有自己的亲军，满洲精锐，有吴三桂等降将统领的能征惯战的铁骑，不断地、迅速地进攻阻碍清朝统一中国的明朝的残余势力和农民军的主力张献忠、李自成联军。对边疆其他少数民族也大举征讨，经过多年战伐，终于统治了全中国。

清朝统治者不仅在武力大定之后立即搞文治，来文武相济，就是在大肆使用武力时，也不忘文事，如前述的为崇祯发丧，宣称替汉明子民报君父之仇即是。就是在两军对垒之际，也不忘要“先礼后兵”，“不战而屈人之国”。多尔袞致史可法的信就是很好的例子。再如打下山东后，下令保护孔子故里等等，而一经局面太平时，就更加加强文治，笼络知识分子。复科举，开博学鸿词，修明史，编各种大型类书、文化典籍。制订法律“大清律”（包括兴科场案、文字狱），都应该说是属于“文治”，以这些文治来统一舆论，加强对清朝统治的向心力，来和武力相配合，统一、巩固和强化大清帝国，保证清朝疆域的空前扩大和长治久安。

在顺、康、雍、乾“四圣人”的努力下，清王朝屹立在世界，到乾隆时，清朝有幅员广阔的疆域，国势强大，是东方最大最强的帝国！

但是，由于历史、阶级、民族的局限，这个强大的头号王国——清王朝，又是矛盾重重、危机隐隐的。不仅人民的反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统治阶级本身，也常常争权夺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整个清帝国在当时是安定、强大的。在这样的安定强大国家里，社会经济随之发展。

战乱中，北方直隶极目荒凉，百姓逃亡，山东每户只存一二人，田十亩只种一二亩。南方苏、浙、湖、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明清史料丙编》819、901页），以四川言，明万历时有地十三万余顷，到清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荒芜十分之九。再加上清政府防止人民与郑成功联系，强迫山东、江浙、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居住的人民内迁，又造成大量的民亡、地荒。

清廷也及时发现“民亡地荒”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康熙八

年(1669年),政府下诏停止圈地。二十四年(1685年)又正式规定“自后永不许圈”(光绪《畿辅通志》卷一《诏谕》),并不断招抚流亡,奖励人口滋生,奖励开荒,“圣世滋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雍正时改良明朝的“一条鞭法”,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减轻农民负担。这样,全国人口、耕地面积良性上升。清廷又特派官员治淮、治黄,兴修水利。并推广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叶等普遍种植。

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发展,在全国各大小城市 and 市镇中,遍布磨坊、油坊、机坊、纸坊、酱坊、糖坊、弹棉花坊,木、铁、铜、漆等作坊,制造各种生活、生产用品、用具、食品、器皿、衣饰、书籍、犁锄,还出现了很多特产工艺品,北京的景泰蓝、象牙雕刻、绢花,南京的刻印,苏州的刺绣、木器,杭州的折扇、剪刀,广东的漆器,福建的茶,安徽的墨、纸,江西的瓷器,四川的锦锻,云南的大理石,新疆的玉石,贵阳的皮制品等等名闻全国,享誉世界,不少国家闻名而求。

手工业还出现了手工工场,工场内有各种分工,“流水作业”,苏州纸坊就有八百余人,有刷、托、洒、推、梅、插、拖、表等八道工序。又出现了“行会”,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发展、流动,这更推动了商业发展,盐商、行商、票商都随之产生并迅速发展,票商主要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代官商办理汇兑、捐纳(相当于近代银行),工商业的繁荣,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物质需求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新局面。

二、清初思想、文化新景观

清初统治者对待文化与对待经济的政策略有不同,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残暴地摧残不利于清的文化,大力发展有利于清统治的文化。

清初文化从哲学思想来说,有明一代理学仍占支配地位,沿程朱学派而来,到王守仁“心即理也”的主观唯心主义“王学”风行,他的“致良知”说,改良了客观唯心主义,强调主观的作用,启发人大胆思想,他的弟子、信奉者王艮、颜钧、梁汝元、李贽等成为王学左派,发挥王学积极的一面,特别是王艮、李贽影响很大。

王艮(1483~1541年),泰州人(泰州城离兴化只二三百里,比扬州还近,与兴化同属扬州管辖),号心斋,王守仁弟子,小商家庭,中年以后发愤读书,属于顿悟型的思想家,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反对向命运妥协,提倡人应该有改变环境的“造命”思想。认为满足百姓日用就是圣人之道。经常到各地讲学论道,特别是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宣传,影响很大。

李贽(1527~1602年)也是王学继承人,是位大思想家。福建晋江人,做过礼部司务、姚安知府,后辞官,到各地讲学,著有《藏书》、《焚书》,大力发扬王学的积极思想,对汉儒以来强调的孔、孟为统治者服务的教条,用以制造顺民的消极面表示公开怀疑,他在《藏书》中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引起统治者的震恐和仇恨,称之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妖人”(《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借口他误杀侍妾,将他逮捕入狱(他在狱中自杀)。他的思想不仅明统治者害怕,清统治者也害怕,屡次下令烧毁他的著作(但仍然留传下来)。

由明入清的进步思想家更多,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及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都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既反对专制主义,也反对民族压迫。黄、顾都曾极力反对明朝的阉党,又组织过抗清义兵。黄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和“工商皆本”的看法,顾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都对后代影响极大。稍晚的唐甄(1630~1704年),四川达州人,在《潜书》中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这是说皇帝是最大的刽子手,唐的反对专制君主的思想与黄宗羲不谋而合。唐甄希望上帝让他办这些刽子手的罪(“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这些进步思想,清立朝以来就大力排斥,而着力提倡程朱理学,笼络了魏象枢、汤斌、李光地等人,封以官爵,称为“理学名臣”,严禁王学。

此时民间却又崛起了一些学者,既反对王学,也反对程朱理学,如颜元、李塨、戴震等。颜、李是师生,颜(1635~1704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李(1659~1733年)号恕谷,蠡县人,都坚决反对

程、朱、王学,主张实用,时人称为颜李学派。

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从科学角度贯彻、宣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感官,本来就是为了适应外在世界而生成的,“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这就是说物质世界是人们感觉的来源,在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理教杀人罪最大,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这就是《儒林外史》里的理教杀人,以及鲁迅《狂人日记》里中国历史都是“吃人”的观点的来源,是对程朱理学的重大打击。

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仍是“正统”的孔孟、汉儒直到程、朱(包括王学)的教条。

与哲学紧邻的史学状况也是如此。史学家一方面受到政治迫害,不少人不去碰历史;另一方面又涌现出大批新史学家,多被清廷笼络指派编修前朝史书。历史学家还写了许多“野史”,私家史学著作,比历朝都丰富。官修的史书有《明实录》、《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私人编著的史书有谈迁的《国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别集》和沈德符的《野获编》等。地方志则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

与前朝相比,清朝历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史。另外,由于不少饱学之士,不甘作清朝顺民,但武力反抗又失败了,就转而将“复国”愿望移注(潜藏)于学术、历史研究,出现了研究当代历史之风,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专门研究明史,特别是明末的历史。万斯同(1643~1702年),号季野,鄞县人,著有《明史稿》,成了官修明史的底本,全祖望(1705~1755年)的《鮑琦亭集》和黄宗羲的《南雷集》虽是两部文集,但其中所写,大多是抗清史事,温睿临还编辑了一部专记南明史事的《南疆绎史》,这些以史实显示观点、研究当代历史的著作,对当时学者影响很大,《国榷》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都受到影响。

此时历史学的另一特点是历史考据风行,对以往史学著作文字舛错,名物、典章谬误多加考订、辨证。如钱大昕(1728~1804

年)的《廿二史考异》、赵翼(1724~1814年)的《廿二史劄记》、王鸣盛(1722~1796年)的《十七史商榷》等都是名作。《劄记》著重论证各代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廿二史劄记》序),独创了一种新的史学考证体例。学者们还对旧史的表、志、注等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有人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失传的古书《旧五代史》(邵晋涵)、《宋会要》(徐松)等。

史学著作的特殊品种——地方志,此时也极盛,各地修志成风,今传方志六千余种,多为清作,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10年),号实斋,浙江会稽人,修志专家,被各地聘请修撰过《湖北通志》、《常德府志》、《和州志》、《永青县志》等多种方志,章氏还是位极有见解的历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修史贵开创,要有“史意”(即“史观”)。

清初文治大胜前朝还表现在图书编纂方面。康熙、雍正时朝廷组织了大批学者编辑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该书共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每编又分门别类,搜罗宏富,是明《永乐大典》后的第一部大类书。乾隆时清廷又选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编辑《四库全书》。该书分经、史、子、集四类,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部,分装成三万六千余册,是我国自古迄清最大的一部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有政府(内府)藏本,有私家(藏书家)献本,有从《永乐大典》辑出,编辑历时十年,编好后,共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六地(现今保存下来的尚有四部)。作为钦定图书,供学者参阅。参加编辑的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又将《全书》内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我国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被八国联军烧抢,今存于国内外的仅有余三百余册)一样,都是我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四库全书》由于编辑者秉承皇帝旨意,不仅在收书时,对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没有收入,而且对收入的图书也有部分删改或抽毁,这就损害了该书的本来面目。

文学方面也成就卓著。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戏剧《长

生殿》、《桃花扇》，短篇小说《聊斋志异》都成了轰动全国乃至震动世界的名著。

小说，首先是清初蒲松龄（1640～1715年）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被后世称为文言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一生穷困，授徒为业，应试到七十三岁才“中举”，过了两年就去世了。蒲公“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穷毕生精力“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说明十三卷《聊斋志异》，四百多篇故事是他借狐鬼妖怪，隐射社会黑暗，发泄他愤世疾俗的感情。这部书并引发了一大批相类的书，如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和邦额的《夜谈随录》等，虽都不能和《聊斋》比肩，但也都是各有特色的。

长篇小说更见精彩，乾隆时期《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三大著作鼎立文坛。曹雪芹、吴敬梓、李汝珍都在著作中提出了新见。《红楼梦》彻底打破了传统写法，以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和男女青年恋爱的喜悲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作者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诉述了“福善祸淫”“盛极必衰”的微言大义，达到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高峰。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才高学博，“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不热心科举，不应“博学鸿词”。《儒林外史》写了当时一群知识分子，讽刺科举弊端和儒士丑态，是讽刺文学的高峰。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河北大兴县人，长期生活在江苏（连云港、草堰），博学多才，特精音韵。《镜花缘》写一百名才女的故事，尊重妇女，提倡男女平等，还借海外奇谈，讽刺社会丑态。“君子国”、“两面国”的描绘，至今脍炙人口。

戏剧方面，洪昇（1645～1704年）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风靡全国。《长生殿》演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欢故事，写逸乐亡国灭身。《桃花扇》描述秦淮歌妓李香君的故事，揭露明末社会黑暗，南明小朝廷腐化堕落，自取灭亡。

文学方面，清初诗文也值得称道，清诗、清词，吸取唐宋之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王渔洋、朱竹垞、纳兰性德等的作品都使唐宋诗

词不得专美。桐城派的古文也不让唐宋八大家，归有光作品更充溢晚明灵秀之气。

与文化关系紧密的还有考据学蔚然成风，顾炎武、黄宗羲开山于前，阎若璩(1636~1704年)、胡渭(1635~1714年)踵武其后，阎字百诗，山西太原人，世居淮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确而且实，所著《古文尚书疏正》，用科学考据，证实尚书是一部伪书。胡字朏明，浙江德清人，所著《禹贡锥指》、《易图明辨》，在辨明古书真伪和提倡疑古精神上都有一定贡献。清初考据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乾嘉学派六十多位学者，又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代表，惠苏州人，著有《九经古义》等，与弟子江声等在经学考证方面贡献很大。皖派以戴震为代表，著有《声韵考》等，与弟子段玉裁(1735~1815年)等在文字、音韵学方面成就很大。段氏《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戴的另一弟子王念孙《广雅疏证》以及赵一青《水经注释》、卢文弨《群书拾补》都是考据方面第一流著作。对整理保存古典文献，正确理解古典，极有功绩。

清初考据学本是为“经世致用”而求实，但后来逐渐转入“避世”，从要求社会改革转入到“为考据而考据”。吴派更有迷信汉儒解经者，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路闭塞，排挤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清初文化繁荣还显示在科技、艺术的繁荣、发展，医学、天文历算、地图测绘、建筑、绘画等方面。乾隆官修《医宗金鉴》，考订《伤寒论》等医典，康熙聘请西方学者南怀仁制定《永年历》，又聘西方传教士白晋等经过三十年测量绘制成《皇舆全览图》，成了当时最完备的中国地图。建筑艺术比前明更为精美，圆明园广达三十里，有一百五十多所楼苑，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技术的特优。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八大庙，都是精美的建筑。

绘画方面，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翥)和吴历、恽寿平等，继承元明画风，形成清初“正统派”。而由明入清的石涛、八大山人和他们的一批崇奉追求者(包括以郑燮为中坚的“扬州八怪”等)，多以泼墨写意，继承徐渭等画风，长于抒情，山水人物花